



千秋功过，

西方「斯大林学」研究

叶卫平 著

谁人评说？

“七五”国家青年社科研究项目

“七五”国家青年社科研究项目

千秋功过，谁人评说？

——西方“斯大林学”研究

叶卫平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156 号

“七五”国家青年社科研究项目

千秋功过，谁人评说？

——西方“斯大林学”研究

叶卫平 著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发行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海淀路 39 号 邮编 100872)

印刷者：中国人民大学印刷厂

经销者：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850×1168 毫米 32 开

字 数：401 000

印 张：16.25

版 次：1993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199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册 数：1-2 300

书 号：ISBN7-300-01534-4/D·222

定 价：9.50 元

目 录

第一章 西方“斯大林学”的上下纵横·····	(1)
一、西方“斯大林学”的主要思想来源·····	(2)
二、西方“斯大林学”的产生和发展·····	(17)
三、西方“斯大林学”的形式和观点·····	(26)
四、我们为什么要研究西方“斯大林学”?·····	(41)
第二章 革命岁月：错误连篇还是基本正确?·····	(50)
一、二月革命以前·····	(51)
二、历史的转折关头·····	(61)
三、南征北战·····	(82)
四、列宁的政治遗嘱·····	(96)
第三章 过渡时期：争权夺利还是辩论方向?·····	(124)
一、斯大林与托洛茨基·····	(124)
二、斯大林与联合反对派·····	(138)
三、斯大林与三人纲领·····	(157)
第四章 肃反扩大化：蓄意谋害还是错抓误杀?·····	(169)
一、肃反扩大化的导火线：基洛夫被谋杀事件·····	(170)
二、军内审判的起因：贝奈斯情报·····	(181)

三、斯大林在肃反扩大化中应负的责任·····	(186)
第五章 世界大战：昏君误国还是力挽狂澜？·····	(216)
一、战争的祸首是希特勒与斯大林吗？·····	(217)
二、“秘密附加议定书”之谜·····	(231)
三、苏军初战严重失利评说·····	(236)
第六章 帮助中国革命：有过无功还是功大于过？·····	(256)
一、所谓斯大林导致1927年中国共产党大失败的 说法·····	(257)
二、斯大林对三次“左”倾灾难应负的责任·····	(278)
三、斯大林对中国解放战争的态度·····	(289)
四、斯大林与朝鲜战争的关系·····	(300)
五、斯大林同高岗事件的所谓联系·····	(307)
第七章 不幸逝世：中毒身亡还是因病而终？·····	(313)
一、斯大林的所谓下毒史·····	(313)
二、斯大林、贝利亚、日丹诺夫的“三角矛盾”·····	(323)
三、贝利亚四人团毒死斯大林说·····	(332)
第八章 “斯大林主义”：确有此说还是强加于人？·····	(347)
一、斯大林两本著作的“版权”争论·····	(347)
二、关于斯大林理论家地位的辩争·····	(364)
三、对斯大林的主要理论著作的批评·····	(373)
四、“斯大林主义”的是与非·····	(395)
五、斯大林模式的功与过·····	(414)
第九章 西方“斯大林学”的主要研究方法·····	(433)

一、“犯罪动机”考查法	(433)
二、文化心理分析法	(449)
三、溯本寻源比较法	(464)
四、历史主义研究法	(482)
附录：本专著所引用和参考的外国著作书目	(500)
后记	(507)

第一章 西方“斯大林学” 的上下纵横

西方“斯大林学”是当代西方一种用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斯大林的思潮。西方“斯大林学”不是一个地域性的概念，而是一个意识形态概念。西方“斯大林学”主要来源于托洛茨基和赫鲁晓夫。西方“斯大林学”的第一批著作出版于本世纪 30 年代，但在 1956 年以前，它和西方“列宁学”一样，只是西方“苏维埃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秘密报告传到西方后，西方学术界对斯大林的研究急剧膨胀，它才成为一种相对独立的思潮。西方“斯大林学”主要通过回忆录和论著这两种形式来阐述自己的观点，是从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哲学、文化学乃至心理学诸学科对斯大林进行的综合研究。从西方“斯大林学”的理论框架看，其中对斯大林的实践和理论持基本否定态度的观点占主导地位，而持相对肯定态度的观点则属于非主导派。西方“斯大林学”的非主导派对我们的研究具有比较大的参考和借鉴价值，它的主导派所提出的各种错误观点也有利于促进科学斯大林学在批判与反批判中发展。

一、西方“斯大林学”的主要思想来源

西方“斯大林学”起源于谁？至今仍然众说纷纭。

从时间上看，最早撰写关于斯大林的文章的西方作家可能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安娜·路易斯·斯特朗。1921年，这位出生在美国内布拉斯加州弗兰德城的美国女性，怀着一颗充满着正义感的心来到了饱受战争创伤的苏俄，帮助美国公谊会服务队把救济品送到伏尔加河灾区。完成了这项工作后，她没有回美国，留在苏联从事新闻工作。1924年她为美国《赫斯特国际杂志》写了一篇文章，大胆地猜测：虽然斯大林不是政府首脑，但是如果谁要来继承列宁的话，这个人准会是斯大林。当时，总书记这个职务既不为联共（布）党中央领导人所重视，也不被西方媒介放在眼里，因此这篇第一次在美国刊登的关于斯大林的文章，并没有引起任何反响。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苏联留下来后，同一位苏联公民结了婚，创办和编辑了英文版的《莫斯科新闻》。她亲身经历了苏联关于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的大论战、工业化、农业集体化、大肃反运动、卫国战争等历史事件，耳闻目睹了整个斯大林时代的沧桑。在此期间，她还同斯大林打过一次直接的交道。当时她同《莫斯科新闻》的俄文编辑发生了严重纠纷，这使她不仅想提出辞呈，还在失望之余想离开苏联一走了之。后来经一位朋友劝说，她抱着碰碰运气的心情向斯大林写信申诉。不料，斯大林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很快打来电话，请她到斯大林办公室来同几位负责同志谈谈她的申诉。电话里的口气很随便，可是她走进斯大林办公室后，却愣住了。因为在场的不但有她所指控的那些苏联人，而且还有斯大林、卡冈诺维奇和伏罗希洛夫。她后来回忆说：

“小型的政治局，全苏联的指导委员会，在处理我的申诉呢。我真感到羞愧了。斯大林先问我是否听得懂用俄语进行的讨论，从而消除了我的紧张。接着他提出了一个问题，让大家去发言。他自己比别人都说得少，他甚至没有坐在桌子上当主席，而是随便地坐在一旁，能够看见所有人面孔的地方。起初，我感到失望，因为他是那样的没有威仪，但在迅速进行的谈话中我就把这一点忘了。后来，我才意识到斯大林正是用偶然插一句话，提一个问题，或者着重地重复别人的话，来引导讨论的进行并使它不离开主题。当他把所有的看法都汲引出来的时候，我开始对甚至那些我所控诉的人都产生了解。我曾想我要辞职并一走了事。我告诉他们这就是我的全部要求。可是当斯大林重复问道：‘这就是全部吗？你在其他方面很满意吗？’我内心潜在的愿望苏醒了，我发现我所真正要求的乃是一张更大、更好的报纸，而有了已经达到的新的了解，这件事现在看来已是可能的了。我说出了这一点，而这正是我们后来得到的东西。从那时起，我就把斯大林看作我所遇到过的最善于主持会议的人，他能够以达到天才程度的速度把各种不同的意见引向和谐，并且在许多不同的意见中间指出正确的道路，从而唤醒和鼓舞要求行动的愿望。”^①

在斯大林时代的后期，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也蒙受过不白之冤。1949年初，她和《莫斯科新闻》的全体编辑人员被安全部门诬为帝国主义间谍，投入监狱，直到1955年才被释放。由于她不愿意随波逐流，又被扣上间谍嫌疑的帽子驱逐出境。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了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其中提到的冤假错案问题是赫鲁晓夫攻击斯大林的重磅炮弹，但她并没有因为自己的6年冤狱而支持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她于同年写了《斯大林时代》一书，由纽约主流出版社出版。这本书从斯大

①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斯大林时代》第20页。

林提出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路线写起，一直写到斯大林逝世为止，对斯大林的功过及其犯错误的原因作了比较实事求是的研究。其中既有她的采访经历中的所见所闻，也有深刻的理论分析；既有热情的讴歌，也有严厉的批评；既有细微生动的描述，也有展示斯大林时代苏联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巨大热情和首创精神的千军万马的壮阔场面。这本书还及时地对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作出了评论，其中写道：我虽然在这本书中采用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来引述斯大林时代的一些重大的弊病，并且在有关的地方讨论了这个报告的若干部分，但是我没有把它作为最权威的材料来使用，因为这里面的证据还不完全，而且也不是结合当时的条件和时间来加以充分估计的。我甚至感到怀疑，赫鲁晓夫用暗示的方法归咎于斯大林的那些过火行为，斯大林是否全都知道？况且，被赫鲁晓夫斥为过去一切坏事的根源的个人崇拜，不仅是被崇拜者的过错，也是崇拜者的过错。我认为，今天任何人也没有能力对斯大林时代作出最后的评判。斯大林是那些需要由长期历史来加以评价的人物之一。他的工作离人们越远，其性质也就会越加清楚。我们至少知道，他从1928年开始在单独一个国家，在一个为敌人的世界所包围的经济技术落后的农民国家里，自力更生地建设社会主义。当他开始的时候，俄国是一个农业的和文盲的国度；当他结束的时候，俄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二个工业强国。而且，他两度这样建设了俄国：一次是在希特勒入侵之前，再一次是在战争的废墟上。这要永远归功于他，因为他是这项宏伟工程的工程师。当然，这个翻天覆地、生气勃勃的伟大时代既造就了千百万英雄，也产生了某些恶魔。比较渺小的人今天可以津津乐道于此并且列举出这个时代的罪恶，但是，那些在斗争中生活过来的人，甚至许多因斗争而死去的人，却曾经忍受了这些祸害，并认为这是建设的一部分代价。

显然，我们不能把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这位第一个描写斯

大林的美国作家，视为西方“斯大林学”的始作俑者。而西方“斯大林学”者在自己的论著中也尽量地回避她提出的问题和观点，当然，更不会把她的论著当作自己的思想来源了。

从西方“斯大林学”的论著中看，它最初的主要思想来源应该是托洛茨基的著作。托洛茨基 1929 年被驱逐出国之后，先后撰写了《俄国革命史》3 卷本、《斯大林伪造学派》、《斯大林的罪行》、《斯大林评传》等著作，把斯大林说得一无是处，甚至说斯大林还不如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纯粹是“金托”^①当政。德·沃尔科戈诺夫读后承认：“打开托洛茨基的书，一个可怕的亚洲式暴君跃然纸上：阴险、残忍、狂热、愚昧、睚眦必报。对此，托洛茨基这个流亡者不惜笔墨，大加渲染。”^②伊恩·格雷也在《斯大林——历史人物》一书中说：托洛茨基认为，由于斯大林的暗算，他才遭到了失败和屈辱。他从来不承认斯大林是苏共和苏联的领袖，他对他所藐视的这个人极尽仇恨之能事。托洛茨基怀着深仇大恨，对斯大林大书特书。与其说托洛茨基是个历史学家，不如说他是个人辩论家，他总是随时随地准备杜撰各种材料往他的仇人斯大林脸上抹黑。

特别是托洛茨基 1940 年 8 月 20 日被暗杀时刚刚草就、后来由其英文版编辑查尔斯·马拉默思加工而成的《斯大林评传》，更是集他 10 年来对斯大林的歪曲和攻击之大成。

《斯大林评传》的序言说：写这本斯大林政治传记的目的就是为了说明斯大林是如何通过篡夺总书记的职位而当权的。斯大林既不是思想家，又不是著作家，也不是演说家，而是一个阴险的机关官僚。他不是依靠个人才能，而是依靠一个与人无关的党机构篡夺权力的。而且不是他创造了这个机构，而是这个机构创造

① 金托（Kinto）在格鲁吉亚语中意为无赖。

② 德·沃尔科戈诺夫：《胜利与悲剧——斯大林政治肖像》第 1 卷第 479 页。

了他。这个机构本来是思想的体现，可是在斯大林手中机构本身却变成了目的。斯大林割断了机构和思想之间的脐带，使机构成为独立存在之物。

后来，罗伯特·丹尼尔斯发挥说：苏联党机关的崛起，以及它的代表斯大林等人同反对派之间的派别斗争是斯大林主义兴起的特定前提。斯大林主义不单单是党机构的表现形式，也是俄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工具与其理想、政治行动与革命良心之间斗争的产物。苏联共产党党内反对派所代表的革命良心没有得到实现，因为斯大林已经使俄国共产主义运动屈服于权力的压力并使它遭到了权力的诱惑。它违背了自己的良心，然后又镇压了它。由此可以推断，如果托洛茨基取得了胜利，事情也许同现在根本不同。尽管党的专政仍然会保存下来，但一人独裁不至于发展到如此登峰造极的地步，思想控制不至于达到如此荒唐的程度，而且也不会出现如此病态的恐怖。另外，托洛茨基似乎也不会依靠党的机关去取胜，而是以反对党机构作为自己胜利的前提，因此他的胜利也许不至于导致后来的这种专政。^①

《斯大林评传》断言斯大林在1917年二月革命至十月革命这段时间里屡犯错误，如果说起了某种作用的话，那也是无足轻重的：二月革命后，斯大林从流放地回到彼得格勒，抹煞苏维埃与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之间的对立，把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解释成两个机构之间的分工不同，即苏维埃进行了革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则巩固了革命，因此斯大林鼓吹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在“民主”的舞台上合演一出戏。列宁回国后，斯大林虽然接受了列宁的四月提纲，但却消极观望，甚至在斯莫尔尼宫也很难见到他。由于他在妥协派心目中不是一个讨厌的人物，因此七月示威发生后，他得以出面说服水兵和卫戍部队把已经胜利

^① 参见罗伯特·丹尼尔斯：《革命良心——苏联党内反对派》第629—630页。

在望的起义当作冒险行动加以否定。七月事变后，斯大林虽然是中央委员兼中央机关报的主编，但却同一个普通的机关工作人员没有什么两样，对十月革命的作用微乎其微；不仅如此，他还同加米涅夫串通一气，阻碍列宁关于举行武装起义的要求的付诸实施，后来又反对把背叛武装起义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开除出党。这不是由于斯大林是个懦夫，而是因为这个阴谋家在紧要时刻总是当骑墙派，想先看看起义结果再说。

后来，夏皮罗·伦纳德的《苏联共产党》一书也照搬托洛茨基的说法，认为二月革命后，斯大林同加米涅夫一样是个中派分子，他们的主张同孟什维克没有什么两样，都申明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尚未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要若干年以后才可能具备。德·沃尔科戈诺夫在《胜利与悲剧——斯大林政治肖像》第1卷中说：斯大林既不会演说，也写不好文章。每当需要斯大林出席群众大会时，他的心里就会产生一种不踏实感；他的著作虽然摒弃了宗教教条的内容，但贯穿其中的却是那种古拉丁人式的简单逻辑。而托洛茨基则把莫杰恩杂技场作为自己发表演说的固定场所，每次演说都赢得了挤得水泄不通的听众，这使斯大林对托洛茨基产生了一种近乎嫉妒的恶感。罗伊·麦德维杰夫在《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一书中写道：七月事变后控制了党中央机关报的斯大林，任意改动列宁的文章，导致推翻临时政府的进程放慢，从而迫使列宁不得不返回彼得格勒来直接领导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由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公开反对举行起义，列宁要求把他们开除出党，斯大林却包庇他们，他是在这个问题上唯一站出来反对列宁的中央委员。10月24、25日那两天决战斯大林都没有参加，甚至没有出席24日早晨由托洛茨基召开的紧急中央全会。

《斯大林评传》评论内战时期的斯大林说：内战时期的军事工作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挑选必要的工作人员，适当地使用他们，对指挥人员建立必要的监督，清除有嫌疑的人，施加压力，进行

惩罚。行政机器中所有的这些活动完全适合于斯大林的才能。另一方面是把人这个原料变成一支军队，感动指挥官和士兵的心灵，激励他们的正确情操，鼓舞他们对新领导人的信心。在这个方面，斯大林完全无能。他从来不亲自向军队发表书面文告，显然他是对自己那学院式的文章缺乏信心。他在他工作过的战线地域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而且他的影响一直是间接的、官僚主义的和警察式的。而这也就是使列宁那么器重斯大林的东西。国家机器所施加的压力越大，革命精神被抛离这个机器越远，斯大林就越加充满信心。最初，斯大林只统率 20 个集团军中的 1 个军，后来领导了 5 至 6 个战线中的 1 个战线。他在那里建立了严厉的纪律，紧紧抓住了所有的杠杆，不容许有不服从。同时，他作为一个集团军的统帅，有系统地怂恿别人违抗战线领导人的命令。他在领导南部或西南部战线时，又违抗总司令部的命令。在过去的沙皇军队中，除了军事上的从属关系外，还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那些具有某种指挥权或高级行政职位的大公们，常常不把上级军官放在眼中，从而在陆海军的管理中造成了混乱。我记得我曾经对列宁说过，斯大林利用其党中央委员会委员的便利，把大公的特权带进了我们的军队。上下级之间有矛盾是自然的事。集团军一级几乎总是对战线一级不满，战线一级总是对总参谋部有意见，特别是在事情不十分顺利的时候尤其如此。斯大林的特点在于他有系统地利用这种摩擦，使它恶化为激烈的抗争。斯大林把他的合作者拉入危险的冲突，从而把他们捏合在一起，使他们更加倚赖他。有两次，党中央委员会不得不直接下令把他从战线召回。但是，每当形势有新的转折时，他又会被派出去。然而，尽管斯大林屡有机会，但他在军队中并没有建立起威信来。可是，那些在他指挥下的军事合作者，一旦被他拉入反对中央的斗争中，以后就一直同他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察里津集团变成了斯大林派的核心。与此同时，斯大林既没有扭转过南部战线的局势，也没

有在东部战线起过重要作用，甚至也没有能够拯救察里津。虽然后来斯大林躲避参加反对弗兰格尔的战役，究竟是因病还是有其他的考虑，现在很难断定，但是波兰战争给他的名誉沾上了不可抹除的污点。

后来，阿·阿夫托尔汉诺夫在《党治制的由来》^①一书中也断定：1919年3月在俄共（布）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形成的军事反对派是由斯大林鼓励和暗中领导的，因为斯大林领导察里津战役时的亲密同事伏罗希洛夫参加了这个派别，而军事反对派成员在斯大林时期都得到了重用。德·沃尔科戈诺夫的《胜利与悲剧——斯大林政治肖像》第1卷则大肆渲染斯大林在内战中不但不具备战役战术知识，而且表现出一个独裁者的派头，就像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国民公会特派员卡里厄，不加控制地对敌人发泄残酷的暴力和激情。罗伊·麦德维杰夫在《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一书中甚至宣称，斯大林到察里津后逮捕了由旧军事专家组成的整个北高加索军区司令部，把他们押入停泊在伏尔加河上的一艘浮船，然后将船沉没。罗伊·麦德维杰夫虽然不敢像托洛茨基那样随意否定斯大林在彼得格勒战线、西方战线和南方战线上的战绩，对此避而不谈，但仍然同托洛茨基一样把苏波战争的失利归咎于斯大林。说什么斯大林由于害怕由托洛茨基亲自指导的西方战线摘走苏波战争胜利的桂冠，因此拒不让他所领导的西南战线按照总司令的命令，把精锐的骑兵第一军团交给已经兵临华沙城下的西方战线指挥，而命令该军团继续向利沃夫方向追击溃逃的波兰第3和第6集团军，以便在它攻占利沃夫城之后，从侧后进占华沙城。

《斯大林评传》断言：列宁从一开始就不同意让斯大林担任总书记这个职务，因为这两个政治人物不但由于在年龄上相差10

① 该书的中文译本改名为《苏共野史》。

岁，而且由于在性格上迥然不同而彼此相距甚远，相互之间不可能有什么友谊。毫无疑问，虽然列宁曾经在 1907 年至 1913 年反动势力猖獗的艰难岁月中对斯大林的实际组织才干表示赏识，但在苏维埃政权的年代里，他一再对斯大林的粗暴表示厌恶，使他们的合作越来越难维持下去。满怀嫉妒和野心的斯大林处处都感觉到列宁在聪明才智和道德品质上比他高超得多，因此愈益变得抗命不羁，并秘密地从事反对列宁的活动。在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期间，季诺维也夫和他的最亲近的盟友决定支持斯大林担任总书记之职，以期利用斯大林对我托洛茨基的敌视来为他们的目的服务。这时，列宁对这个人选表示了异议，他在同他的密友们作的一次非正式的讨论中这样说道：斯大林这位大司务除了做辣菜之外再也不会做什么别的了。

西方学者的看法与托洛茨基大同小异。他们或者说斯大林在俄共（布）十一届一中全会上出任总书记一职是由季诺维也夫提名的，或者说是由加米涅夫策划的，列宁对此至多只是予以容忍或表示同意。而列宁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总书记这个职位在当时无足轻重，只不过是党内行政事务的管理员。而当时列宁、托洛茨基等人的失误在于都把行政管理工作视为一种负担，因此它才非斯大林莫属了。

《斯大林评传》宣称：1923 年 2 月底即列宁第二次卧病不起期间，一次 4 个政治局委员即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我会晤，当秘书离开后，斯大林告诉大家说，列宁曾突然把他叫去，向他要毒药。因为列宁认为自己的病已经没有希望了，他预料自己的另一次中风快要发作，因此不再信任自己的医生的治疗。斯大林说完后没有表示任何意见，仿佛在观望别人要说些什么。加米涅夫脸色苍白，默不作声；季诺维也夫手足无措，就像他过去在困难时刻一直表现的那样；我则坚决表示反对。当时已经极度不信任斯大林的列宁怎么会向他提出这个要求呢？答案是简单的：

列宁认为斯大林是能够满足他这个凄惨要求的唯一的人，因为他有直接的兴趣来这样做。同时，他可能也想试试斯大林，这个专烧辣菜的大司务将会怎样热衷于利用这个机会？而斯大林果然没有放过这个机会，但由于我反对，他是单独秘密行事的。我设想斯大林毒死列宁的过程大致是这样的：列宁1923年2月底向斯大林要毒药，3月初他再次瘫痪。当时医生认为列宁的病预后很坏，斯大林得意忘形了，他开始像列宁已经死掉了一样地行事。不料病人作弄了他。列宁那强健的体质，在他那不屈不挠的意志支持下，再次顽强地挣扎了过来。快到冬天的时候，列宁的病情开始慢慢的好转，可以比较随意地转动；听别人读或者自己阅读；他的说话能力开始恢复。医生的诊断越来越有希望。这就迫使斯大林立即对自己的命运问题作出抉择：要么立即取列宁而代之，要么被列宁贬黜为党的第三流角色。斯大林不顾一切地追求全部权力，并且已经牢牢地抓住了其中一部分最重要的权力。现在他离自己的最终目标已经很近了，可是从列宁那里来的危险离他更近。于是，他下了立即行动的决心。他到处有自己的同谋，他们的命运同他的命运是完全联系在一起的。他手边还有从前当过药剂师的政治保卫局领导人雅戈达。虽然我不知道斯大林是把毒药送给列宁，同时暗示说医生认为他已经没有希望康复了，还是采取了更为直接的手段。但我坚信，斯大林在自己的命运悬在一根线上的时候，他不能消极地等待，必须干掉列宁。1924年1月中旬之后不久，我动身前往高加索的苏呼米，打算到那里医治一种顽强而神秘的传染病。我在途中得到了列宁的死讯。我立即通过直线电报告诉克里姆林宫：我认为有必要回返莫斯科，但不知葬礼什么时候举行？一个小时后斯大林发来复电，告诉我葬礼将在星期六举行，我已经赶不上葬礼了，因此不必半途折回。可是后来我发现葬礼改在了星期日进行。斯大林欺骗我可能是担心，我会把列宁的死同一年前关于毒药的谈话联系起来，询问医生有没有用